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天民,张艳波¹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从两种生产、性别分工、家庭形式演变等多个层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原因,而且从发展生产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多个角度展示了妇女解放的路径。面对当前妇女解放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点,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等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生产方式; 性别分工; 家庭形式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4)01-0057-06

DOI:10.13967/j.cnki.nhxb.2024.0010

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1]这一重要思想表明了新时代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的实践原则与价值立场。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要融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使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因此,在新的时代主题下,深耕马恩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沃土,拓展妇女解放与发展实践路径,对于把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一 女性地位衰微的多维因素探索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人类起源、社会发展和妇女解放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该著作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点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系统论析。借助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深刻阐释,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的波折变化,特别是达至高峰后趋于衰落式微的多重复杂原因。

(一) 生产方式不平衡下的女性弱势地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观点。恩格斯指

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13} 恩格斯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新阐释,也为揭示历史中女性弱势地位形成的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

就两种生产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物质生产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人口生产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原始社会时期物质生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对原始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产劳动中,劳动者必须将自己的手和脚作为劳动工具并以此来完成生产过程,因此人口生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从两性劳动的结果来看,女性所从事的采集野生果实和制作衣食等活动相比于男性狩猎有相对稳定和可观的收入,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起到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13}。在原始社会早期,无论是人口的生产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女性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也造就了女性在这一时期较高的社会地位。

[收稿日期] 2023-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资助(编号:20&ZD043)

[作者简介] 王天民(1970—),男,山东济宁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¹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也对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新的生产方式对原有的采集狩猎模式造成冲击,也对以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强有力的打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男性是畜群和作物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相应的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这些新的身份标志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相比较而言,女性所占有的物质资料在社会生产中显得微不足道,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减弱,最终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二)传统性别分工中的女性从属身份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2]175}可见,人类最初的分工有赖于人的生理特性,是为实现人的生存繁衍而自然形成的两性分工。在这样的分工形式中,两性在各自的生产领域中分别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而血缘家庭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着社会生产的组织和分配等关键环节,妇女作为家庭主人的身份也就自然奠定了她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性别分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范畴。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改变了男女的分工形式,也重新调整了双方在物质资料方面的占比。“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2]64}占有财富的增加提升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对遗产继承权问题提出了挑战。相对而言,女性的分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却由于不得不满足男性继承权的要求而废除母权制的传统。恩格斯认为“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2]66}从此,丈夫掌握了家里的话语权,而女性则沦为了生育的工具。

(三)家庭模式演变中女性地位的式微

家庭不仅是反映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微小单元,也是以人类两性性别为基础的婚姻组织形式。家庭作为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其自身结构形式的演变,在反映两性交互关系的同时,也折射出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历史轨迹^[4]。

在蒙昧时代,人类通过杂乱无章的性关系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在这样杂乱的两性关系之上还无法

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这一时期,人的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保证出生人口质量,杂乱无章的性关系逐渐被一些不断细化的性禁忌所约束。正如恩格斯所言:“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在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2]55}性禁忌的出现表明两性结合开始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男女结合的范围逐渐缩小,开始走向第一个婚姻家庭模式——血缘家庭。血缘家庭的出现是人类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形成的一种两性结合状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普那路亚家庭是群婚家庭发展的最高模式,它通过排除同一部落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进而促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两性结合。这一做法不仅有效避免了同一部落内部由于同辈之间近亲结婚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加强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系,并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向母系氏族社会发展。母系氏族社会是女性社会地位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偶家庭出现源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古代遗传的两性关系随着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逐渐失去其朴素的原始性质。女性通过暂时或长久的与一个男子进行结合来摆脱群婚制所带来的屈辱和难堪状态。对偶婚制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女性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尊严的结果。但是对偶婚也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之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2]63}。按照当时性别分工的结果,丈夫是劳动工具、家畜和奴隶的所有者,这一分工的结果使得男性逐渐掌握更多的物质财富。恩格斯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2]64}

专偶制家庭的出现源于男性确定遗产继承资格的需求,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财产传承。一夫一妻制的确立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2]76}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绝不是个人相爱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形式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实行对女子的专制,要求女子为他生产只能是他自己的并继承他财产的子女。对于这种婚姻关系在资产阶级中的表

现,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而更常见的是妻子。”^{[2]82}

二 女性解放的核心问题探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 妇女解放命题的提出也需要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相应的物质条件。恩格斯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对妇女被压迫被剥削状况的揭露和批判,内在地蕴含着推动妇女解放的思路和主张。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女性解放的物质前提,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环节。为推动女性解放,恩格斯主张让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使家务劳动摆脱私人服务的狭小领域,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一) 生产力发展是女性解放的物质前提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变女性在生产中的弱势地位。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6]222}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包含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两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早期,生产生活资料实行公有制,女性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生产力发展,在新的生产方式作用下物质资料出现剩余,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2]62} 此后,在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父权社会下,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急剧发展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马克思预言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时,生产力的发展将带来物质的极大丰盈,人类将进入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这时将实现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发展生产力是推动女性解放的宝贵历史经验。人类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关键时期。在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女性感受到自身的受压迫地位,并发出要求实现解放的强烈呼声。随着呼声不断高涨,世界上各地的女权运动此起彼伏。女

权运动的出现既意味着女性实现自身解放意识的不断增强,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在解放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碍。每当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时,“妇女回家论”的口号总是甚嚣尘上,妄图将女性重新禁锢到家庭中去。事实上女性解放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女性的解放,两者相辅相成。

(二) 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蒙昧时代,女性承担的采集工作不仅与男性狩猎共同作为社会生产的内容,而且在原始社会实行的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女性的家务劳动也具有社会公共生产的性质。因此女性劳动的全面公共性决定了她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不断丰富,男性的天然优势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新的社会分工中,女性仍然从事家务劳动,但是其劳动的公共性渐趋丧失,成了一种服务于男性的私人劳动。在自身劳动丧失了社会公共属性之后,女性劳动便成了社会劳动中无足轻重的附属品,随之而来的女性社会地位衰落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2]178}

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参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6]57}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社会生产中通过劳动得以实现,决定着人的本质的生产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全面生产。因此,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2]85} 应该理解为女性对公共事业的参与是全面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局部参与。女性除了要参与经济层面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外,还应该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投入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当中。片面的参与不仅会造成女性社会地位的畸形发展,也不利于女性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环节

家务劳动是限制女性解放的关键一环。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大批妇女进入到社会生产公共领域,但是她们在承担社会公共劳动的同时,也要负担起家务劳动的重担。在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压

力之下,女性仍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在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178-179}。

繁重的家务劳动成为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限制因素。家务劳动对于社会生产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作用,但是其一开始就与女性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原始社会时期的天然性别分工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家务活动的主体,此时的家务劳动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改变,家务劳动逐渐从公共属性演变为带有强制性和附属性的私人劳动,男性凭借在社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无偿占有女性家务劳动成果,而女性几乎丧失了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权利。如今,家务劳动的需要、女性生理因素的限制以及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很难摆脱家庭的限制而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恩格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2]85}。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观点。家务劳动是一种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是维系家庭成员生存繁衍、实现家庭功能结构的普遍化的劳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劳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必要前提。工人的社会劳动得到了资本家工资形式的补偿,但是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必须经过家务劳动的再加工才能够产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从这一点来看,工人的必要劳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社会部分和家庭部分,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得到社会以工资形式的补偿。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使家务劳动从私人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劳动。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妇女的劳动将不再限于个体家庭的私人服务领域,而成为具有社会性生产价值的公共劳动,进而推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当代启示

新时代妇女解放事业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重视女性精神文明的建设,筑牢女性解放的物质和精神根基。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其中要充分重视女性的受教育权,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现象,为女性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最后,面对限制妇女发展的家务劳动问题,要积极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解决女性发展的后顾之忧。

(一) 不断夯实女性解放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同向发力。要解决当前我国妇女解放事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仍需要不断夯实女性解放的物质和精神根基。从物质的视角来看,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中去探索女性受剥削、被奴役地位形成的原因,并深刻指出导致妇女地位衰微的物质性根源在于私有制。同样,未来女性解放的方向也应从生产发展的规律中去把握,以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为基础,为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稳定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妇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7]这是目前我国妇女解放事业仍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应该归结到我国当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上来。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制约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我国诸多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状态,这成为限制女性实现成长的障碍。例如在教育领域,仍然有部分女性无法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从而使其失去教育成长的机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存在着针对女性群体的不公平现象。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说明现时想要实现女性的解放,仍然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须知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没有女性全面的彻底的解放。当前,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在新的征程中,我们应将妇女解放的目标融入新的伟大实践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妇女解放的最终落脚点,实现妇女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女性解放的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去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积极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

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向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抓手,妇女解放的事业同样不能例外。在党的带领下,广大女性身上所发扬出来的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赵一曼、刘胡兰等女英雄,她们身上展现出的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勇气至今仍让人感到震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妇女发扬“半边天”精神,积极投身社会生产,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全国妇联在中国妇女第六次

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向广大妇女发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号召,从此这一“四自”精神历经时代发展,被妇女诠释出新的内涵;进入新时代,广大女性继续弘扬“四自”精神,在抗击疫情和现代化建设中焕发新时代巾帼力量。女性是人类文明的建设者,重视女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女性对自身认识的觉悟,而且将进一步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

(二) 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对广大妇女寄予期望,“希望广大妇女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8]。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女性人才,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巾帼力量。

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首先要重视女性教育,教育对于女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使女性适应社会,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根本保障。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不考虑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大专教育程度的女性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者,劳动参与的几率要高2.061倍,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比未受教育者高2.663倍。”^[9]可见,教育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参与劳动,提升女性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张桂梅校长坚持教育改变女性命运的价值理念,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要充分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社会的力量来保证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以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其次要消除性别歧视,重视女性在价值创造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文化观念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性别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社会成员仍然存在将女性看作附属、工具的陈旧思想观念,甚至有所复燃。例如,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影响导致了女性形象商品化倾向。在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常常出现在电子产品、汽车等商品的销售广告中,商家通过年轻靓丽的女性形象来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商家将女性形象作为商品促销的手段,暗含着对女性的歧视意味。而在价值创造领域,在人类文明创建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同男性一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当女性取得巨大成绩时,往往首先遭遇到的是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似乎只有当女性抛弃自身特征,符合男性确定的女性形象标准时,她取得的成绩才能得到认可。例如,

“女汉子”一词的出现,展现了现代女性坚强独立的一面,但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她们必须改变天然的性别特征,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种价值观念背后反映的仍然是社会男女平等认知的偏差。这些不恰当的声音始终在提醒着我们,消除对女性的偏见,重视女性创造的社会价值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要重视社会生产领域内,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女性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性工程,人才则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就不能忽视女性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通知中指出:“女性科技人才是科技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科技事业十分重要的力量。”^[10]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女性科技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实现了我国中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陈薇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个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王亚平迈出了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等。我国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女性科技工作者奋斗的身影,但是也需要意识到在高层次人才中女性占比偏低,以及女性科技者在职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多重障碍问题。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女性的科技贡献,也要为女性人才的发展提供全面坚实的保障。

(三) 积极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

从最初的性别分工开始,妇女就与家务劳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随着家务劳动从社会领域逐渐转到私人领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为此恩格斯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路径。一直以来,女性都是家务劳动的主体,繁重的家务劳动占据了女性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女性对公共事业的参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发生了改观。一方面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社会上出现了可提供家务劳动的智能机器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出现了一些专门提供家务劳动的个人和公司,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为家庭提供各种家务劳动服务。种种现象的出现,似乎预示了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但是从本质来看,这些现象仍属于资本主义私

有制下的市场行为,是家务劳动市场化的趋势,其产生的高额成本难以为一般家庭所承受。其目的本身也并不是想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开辟的一个新的劳动市场。

家务劳动除去日常的生活打理外,更重要的是育儿和养老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占据了女性较多的时间精力。为了更好地帮助家庭解决负担,提升生活质量,一些地方出现了老年食堂,食堂运营通过经济上政府的部分补贴、企业捐赠以及招募志愿者的方式为老人提供营养饭菜以及各项护理服务。这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也为真正解决女性的家务劳动问题提供了借鉴。对比来看,家务劳动市场化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必然结果,其营利性目的并不能真正解决女性的家庭劳动负担。而老年食堂的成功离不开公有制的前提,也离不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理念,这两者结合之下的老年食堂运营模式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可能路径。

四 结 语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文明阶段的研究空白,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女性社会成员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伟大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包括全体女性在内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必须直面当前女性社会成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务实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现代化建设事业,加快推进女性社会成员发展事业,切实做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充分尊重女性

主体地位,大力发扬女性优势与潜力,以文明和谐两性关系的建树,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8.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王峰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历史发展: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互文性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69-82;164.
- [4] 潘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0.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EB/OL].(2021-09-08)[2023-06-02].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3262.htm.
- [8] 习近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N].人民日报,2021-03-07(1).
- [9] 刘爱玉.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3):118-127.
- [10] 《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EB/OL].(2021-06-17)[2023-06-0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19/content_5625925.htm.

Women's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ANG Tianmin, ZHANG Yanb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ngels' classic work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ot only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women's oppress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wo modes of produc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orms, but also shows the path to women's liber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labor, and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in women's liberation, we should take Engels' ideas on women's liber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art from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harness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social production, exploring possible paths towards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production mod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family structure

(本文编辑:王萍)